



左

晚清巨人传

宗棠

主编 / 徐立亭

著者 / 安静波

哈尔滨出版社

K820.52

1
3

94443

晚清巨人传 徐立亭 主编

左宗棠

安静波 著

哈尔滨出版社

责任编辑:姜世栋

王 放

选题策划:王 放

装帧设计:王 卓

晚清巨人传

左宗棠

Zuǒ Zōngtáng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发行

黑龙江省五常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1/32·19印张·410千字

1996年3月第1版·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 000册

ISBN 7-80557-897-4/K·27 定价:27.00元

前 言

特殊历史机遇使左宗棠从一个贫瘠山区的普通塾师，走上了政治舞台，成为叱咤风云的民族精英。

左宗棠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中，他威武不屈，毫无奴颜媚骨，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为了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统一大业，他勇赴国难，虽“马革桐棺”在所不计。这种以天下为己任，不顾个人荣辱生死的献身精神，在晚清封疆大吏中实属独树一帜，绝无仅有。近代中国对外战争中两次重大的军事胜利——收复新疆和镇南关大捷，都与他的名字紧紧相连。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丰碑上，应该镌刻上左宗棠的英名。

左宗棠又是一位励精图治，顺应历史潮流的改革者。为了富国强兵，他勇于开拓进取，力主向西方学习，成为中国早期近代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在推进近代经济，加强近代国防和培养新式科技人才方面，都做出了可贵的努力与贡献。

左宗棠还是一位重民主义者。他深悉“民为邦本”真谛，为官之后，每到一地都关心民瘼，注意爱惜民力，为民兴利除弊，并引导民众发展近代工商业，使传统民本主义思想放射出时代异彩。但是，民本主义又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它从治人者的长治久安出发，必须服从于皇权。因此，当农民起义威胁到皇权时，左宗棠又义无反顾地血腥屠杀敢于造反的民众，犯下了严重历史罪过。

左宗棠是新旧矛盾交织、中西文化早期融合中的过渡性人物。他具有多维的矛盾性格。他既爱国又忠君；既有光明磊落、刚直不阿、廉洁奉公、洁身自好、疾恶如仇的可贵品质，又有清高自

负，感情用事、自我夸耀的缺陷；既有乐善好施，周济灾民、部下和亲朋的宽宏大度，又有争强好胜，骄傲偏颇，难以容人的刻薄。严于律己，不畏艰险，勇于任事，是其所长；意气之争，不能宽以待人，则是其短。左宗棠的一生，瑕玉互见，但瑕不掩玉。闪耀在左宗棠身上的最宝贵的思想品格，是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深厚的民本主义。二者交相辉映、贯穿其一生，使他在晚清的大舞台上演出几幕威武雄壮、振奋民族精神的历史剧，成为一名铁骨铮铮的民族英雄。

左宗棠虽然辞世一个多世纪，但岁月流逝并未抹去巨人的足迹。不论其立身行事，还是其功过是非，都给后人留下种种思考和感悟。这正是撰写左宗棠传记的魅力所在。

本传的撰述，力图将传主放在大的时代、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并通过叙述其有关家世、学识、品格、气质、社会交游及其一生中各个历史时期重大的政治、军事与经济文化活动，实事求是地揭示其真实面目，探究其思想行为产生的社会原因、文化传统、个人内在素质以及对近代社会的巨大影响，力图作出客观的、公正的历史评价，既不溢美，也不隐恶。尤其着重从左宗棠的重大活动中，探索其精神世界，力求给人们以历史的教益和理性的启示。

限于笔者理论与业务水平，加以时间匆促，其中疏漏与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位专家和读者不吝赐教，是所至望。

安静波

1996年5月

目 录

第一章 茫茫神州一学子	(1)
一、时代与故乡	(2)
生于晚清衰世	(2)
深受湖湘文化陶冶	(6)
二、家世与家风	(16)
清贫的耕读之家	(16)
崇俭好施的家风	(18)
严格的家庭教育	(19)
三、治学与师友	(22)
另辟治学蹊径	(22)
幸得良师益友	(24)
四、大器晚成	(27)
遗卷中举	(27)
三次会试不第	(30)
巧遇“伯乐”	(38)
家有贤妻一知己	(42)
储学积能	(46)
五、心忧天下	(67)
燕台杂感	(67)
“欲效边筹裨庙略”	(69)
夜话湘江舟	(76)
第二章 幕僚生涯的沉浮	(87)

一、应募张亮基	(88)
太平军进湖南	(88)
避居白水洞	(98)
运筹长沙崭露头角	(102)
二、入幕骆秉章	(107)
二次出山	(107)
“外援”与“内清”	(111)
对中外战局的关注	(128)
三、宦海风波	(130)
群僚举荐的奇才	(130)
在樊燮事件中	(132)
多方营救 幸免于难	(137)
第三章 在镇压农民起义中	(149)
一、组建楚军与太平军对抗	(150)
招募的“楚军”	(150)
转战赣皖与攻剿浙杭	(155)
二、刚直无隐与偏颇矫激	(168)
与曾国藩的矛盾	(168)
与郭嵩焘的齟齬	(176)
三、借师助剿在浙江	(181)
清廷的决策	(181)
对“借师助剿”的保留	(184)
四、督师闽粤	(190)
奉旨入闽督战	(190)
赴粤督师远征	(194)
五、进兵陕甘	(200)
捻军活跃在陕西	(200)

“运河长围”	(205)
反清的民族起义	(208)
镇压陕甘起义军	(211)
六、恢复经济发展生产	(216)
浙、闽地区的经济复苏	(216)
陕甘地区的善后举措	(221)
第四章 洋务“骄子”	(239)
一、“借法自强”的帷幕	(240)
“求强”与“求富”	(240)
洋务运动的摧化剂	(244)
从经世派到洋务派	(247)
二、创办福州船政局	(251)
在非难中艰苦创业	(251)
“自造、自驾、自管”	(262)
“权自我操”	(265)
船政局的兴衰	(272)
创立求是堂艺局	(290)
船政局的矛盾	(301)
三、缔造甘肃近代工业	(308)
创办甘肃机器制造局	(308)
兴建兰州织呢局	(310)
机器治泾工程的尝试	(315)
第五章 收复新疆	(325)
一、新疆危机的由来	(326)
英俄在中亚的角逐	(326)
阿古柏匪帮的残暴统治	(331)
阿古柏与英、俄的勾结	(335)

二、“海防”与“塞防”之争	(343)
对新疆局势的关注	(343)
一场国防战略部署的争论	(347)
力主规复新疆	(355)
三、收复新疆的重大部署	(364)
排除干扰统一事权	(364)
积极筹饷以解后顾之忧	(367)
改善运道与筹集粮秣	(371)
整编军队以提高作战能力	(377)
四、征讨阿古柏匪帮	(381)
确定西征战略方针	(381)
收复北疆重镇	(383)
打通南疆门户	(388)
规取南疆八城	(396)
五、西征中的外交斗争	(403)
中英之间的针锋相对	(403)
中俄之间的周旋和较量	(408)
六、光复新疆	(412)
正义之师与各族人民的积极支持	(412)
正确的决策与指挥才能	(414)
收复新疆为民族立功	(422)
第六章 中俄伊犁交涉	(433)
一、“先之以议论”	(434)
沙俄食言拒还伊犁	(434)
痛斥“崇约”丧权辱国	(438)
二、“继之以兵威”	(446)
“壮士长歌”	(446)

痛剿残匪	(449)
北极熊吐猎物	(452)
还我河山	(462)
第七章 开发大漠	(468)
一、建省改制	(469)
五次奏请新疆设省	(469)
组织善后局与振作政风	(480)
二、为民兴利除弊 造福一方	(482)
安辑流亡与屯田垦荒	(482)
改革赋役制度与兴修水利	(484)
推广蚕桑与振兴畜牧	(487)
大修墙、城、渠、路、林、桥	(488)
筹设铁厂与厘定币制	(493)
振兴文教与开启民智	(496)
三、为政清廉	(499)
“清介”不苟取	(499)
反对攀附援引	(500)
解衣推食	(501)
“不可沾染世宦积习”	(503)
第八章 内调军机和外放两江	(513)
一、入值军机 位极人臣	(514)
枢垣期间的施政抱负	(514)
曲高和寡出中枢	(517)
二、外放两江 政绩不凡	(521)
兴修淮河等水利工程	(521)
创建码头、电报、煤矿	(525)
赈灾济商	(528)

三、整顿江海防务	(532)
加强海陆军建设	(532)
增设江防要塞	(535)
创立沿海渔团	(538)
四、运筹于千里之外	(540)
力主援越抗法	(540)
支援“黑旗军”反击侵略者	(541)
组建“恪靖定边军”	(542)
第九章 忠忱抗法 晚节可风	(549)
一、受命于危难之时	(550)
二次入值军机	(550)
古稀老师前线督征	(553)
二、坐镇福州 指挥若定	(555)
布置闽江防务	(555)
“昼夜孜孜以谋援台”	(556)
恪靖定边军与镇南关大捷	(560)
三、“乘胜即收” 无力回天	(563)
“中国不败而败”	(563)
壮志未酬 遗恨终生	(566)
附录	
大事年表	(571)
参考书目	(590)
后记	(596)

第一章

茫茫神州一学子

左宗棠生于西方殖民主义者纷至沓来和清王朝由盛而衰的多事之秋。民族的苦难和社会动荡，使他忧国忧民，也给他提供了报效国家、施展才华的历史机遇。早年耕读之家的清贫生活、仕途的挫折和经历的坎坷，使他饱尝沧桑与艰辛，但也磨炼了他的意志，增长了才干。湖湘文化的濡养和陶冶，熔铸了他的性格和情操，也给了他至深的消极影响。时代的呼唤，进步社会思潮的沐浴、师友的启迪，使他博览群书，立志走“经世致用”之路。这些都为他跻入军界和政界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奠定了雄厚的根基。

一、时代与故乡

生于晚清衰世

嘉庆十七年壬申十月初七日（1812年11月10日）凌晨，湖南省湘阴县东乡左家堰，有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妇，梦见一神人从天空降落她家院子里，自称是“牵牛星”，不禁一吓醒来，即听说儿媳又生下一个男孩，并见产妇房中一片白光，顿时屋中的灯烛都显得暗淡无光，不多一会儿，天就亮了。这个在“牵牛降世”神话中诞生的婴儿，便是左宗棠。

左宗棠出生的年代，从整个世界来看，正是欧美各国先后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或社会变革，相继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重要时期。十八世纪后期，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第一次近代化大浪潮，进而拉大了东西方的发展距离。古老的东方成为西方猎取的目标。当十九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大潮裹挟着腥风血雨滚滚而来的时候，统治中国二百多年的清王朝已经度过了它的“康乾盛世”，走向了衰败的晚期，丧失了原有的活力和生机。可是，中国这个有几千年历史的封建大帝国的内部各种机制却具有很高的稳定性和牢固性，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结构不是西方商品大潮所一时能够冲毁的。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依然根深蒂固；高度中央集权专制的官僚政治体制，直至十九世纪末仍未发生根本性的分化；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儒家传统文化，更是深深地植根于每个人的心中。加之清代以来文化专制的高压政策、以

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长期以来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闭关锁国的对外方针，以及夷夏之防、重义轻利、鄙视科技的传统观念和价值取向，使得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不仅只能是后发外源型的，而且也不可能像日本那样，在外力挑战面前，通过积极主动的自身改革，走上近代化的道路。面对着西方列强，咄咄逼人的气势，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者在无可奈何的消极思想支配下，越来越自觉地向保守、封闭的道路。乾隆皇帝在《御制诗》中写道：

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

人事天时诚极盛，盈虚默念惧增哉^{〔1〕}。

由于清朝统治者将闭关锁国当作一种国策，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世界资本主义与中国文明交往的通道，致使封建的中国只能在旧的治国模式中，缓慢地爬行，因而进一步拉大了中国与西方先进国家的距离。当中国社会进入十八世纪后期，上一个世纪孕育和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都相继暴露出来。首先，土地兼并且趋严重，湖南巡抚杨锡绂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的奏折中提到：

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2〕}。

造成土地兼并和集中的原因有二：一是大地主、大贵族、大官僚疯狂地掠夺农民的土地，比如乾隆朝居官20年的军机大臣和珅占田8000余顷，他的两个家人也各占有土地600余顷。鸦片战争时期的直隶总督琦善，占地256万亩。这些满汉地主占有绝大部分土地，对无地少地农民进行残酷的封建剥削，过着“食租衣税”的生活，造成广大农村剧烈的阶级分化，大批自耕农、半自耕农沦为佃户或流民。二是清代人口剧增，据《东华录》记载，清顺治八年（1651年）全国人口大约在6000万上下，到道光十四年（1834年）已经超过4亿，不到200年间，人口增加了六倍以上。这同当时的生产力相比，其增长的速度和数量都是惊人的，它大大超过了社会负荷。在一个农业国度，人口增多，即是农民和地

主的增多。小农增多，则土地分割愈碎，生产和再生产的能力势必削弱；地主增多，则兼并之家愈多。因此，人口的增长亦会促使土地兼并加速，这势必造成农民生活的日趋贫困。与此同时，地主对农民的地租剥削率也是很高的，基本上占生产物的百分之五十，“岁取其半”。正租以外，地主还强迫农民交纳押租、预租等各种名目的附加租。无地少地的农民除了负担繁重的地租外，还必须向当朝统治者交纳繁重的赋税。清政府虽然表面上宣布“永不加赋”，实际上在征收的时候，在“地丁”正额之外，又以各种名目增添附加税，形成所谓“私派倍于官征，杂项浮于正额”的严重现象。而且地主官僚又想方设法把这笔负担转嫁到无地少地的农民身上，这叫“以小户之浮收，抵大户之短欠”。如此繁重的地租和赋税的勒索，就使农民往往是“场功既毕，米谷随尽，至有糠秕糊口者”，只有“今日交租，明日乞贷”，更有“卖男鬻女以偿租者”。“中稔之岁，人不宿饱，一遇凶荒，流亡道路。”这些都是当时农民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严重束缚。这个时期，自明朝中叶开始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虽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其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占比重不大，宛如封建经济汪洋大海中的几叶小舟，发展极为艰难而缓慢。落后闭塞的封建自然经济仍是基本的经济形态。由于清廷的长期闭关锁国和重农抑商政策，造成了社会生产力的停滞状态。

政治上，清王朝集中国二千多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之大成，满洲贵族实行高度中央集权，消除了相权，这就更加强化了皇帝决策的独断性。这种体制就决定了：它的官僚政治体制，只能是一个因循、苟且、敷衍、毫无创造力的惰性运转的官僚机构。“多磕头，少说话”成为封建官场的金科玉律。而且这种封建官僚政治体制，由于没有制止腐败的有效机制，乾隆以后，贪污案件层出不穷。嘉庆四年（1799年），军机大臣和珅的财产被抄没入官，按

银折合，竟在四亿两，可抵清廷八年的财政收入，故当时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谚。整个吏治已经腐败不堪。英国殖民主义者为了打开中国市场，攫取暴利，向中国大肆倾销杀人不见血的毒品鸦片，从1800年到1820年20年间，每年输入的鸦片约有4000余箱左右。到1839年，达到35000行箱。烟毒泛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灾祸：由于鸦片输入的逐年增多，改变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长期优势，引起中国大量白银外流。清政府为缓解财政困难，大搞卖官鬻爵，仅1843年—1850年间，各省报捐人数达62000多人，凡事“非贿不达，非贿不行”。各级官吏吸食鸦片，不仅将这笔巨大的耗费用各种手段转嫁到农民手工业者的身上，而且由于鸦片走私行贿，使清朝官吏贪污受贿成风，更加直接败坏了吏治。此外，鸦片吸食者由统治阶级及其依附阶层迅速扩大到社会下层。黄爵滋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的奏折中说：

其初不过纨绔子弟，习以浮靡，尚知剑戟，嗣后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置买烟具，为市日中。

鸦片不仅毒害了中华民族的身心健康，摧毁了社会生产力，而且也泯灭了他们的良知，种种罪恶由此而生。烟毒泛滥成为当时最难医治的社会公害。下层人民大众的反抗斗争连绵不断，嘉庆元年（1796年）北方爆发的白莲教大起义，烽火燃遍湖北、四川、河南、甘肃、陕西五省，坚持斗争长达九年之久，嘉庆十八年九月，由林清率领的一支天理教起义军一度攻入紫禁城，在隆宗门一带与清军激战，震撼了最高统治者的殿堂。在南方，天地会领导的反清斗争也在持续进行。这些起义虽然先后被镇压下去，但他们的斗争，都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的统治，使大清帝国陷入危机。正如龚自珍所深刻指出：当时的封建社会已是“日亡将夕，悲风骤至”，处于“大乱”将起的“衰世”。

上述情况表明，清朝建国后的200多年间，由于将自己隔离

于世界大潮之外，没有为自己寻求一条新的出路，而是沿续着一条封建旧王朝由盛而衰的老路，逐渐走向了自己的尽头，致使中国远远地落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后面。落后就要挨打，衰弱的中国变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竞相侵略和掠夺的对象。

然而，中华民族毕竟是有着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每当国家遭至外来侵略的严重关头，都涌现出一批思想敏锐、具有忧患意识、爱国情愫，对国家对民族具有高度使命感、责任感，勇于进取，并以天下为己任的进步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改革家、革命家。尤其湖南省，其特殊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更造就了近代一大批叱咤风云、影响历史进程的人物。左宗棠即是这批人物中的一位。

深受湖湘文化陶冶

湖南是华中地区的一个内陆省份。北阻大湖，境内多山，远离全国政治中心，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经济文化落后状态，直至清代道光年间，在全国各省中仍属于不发达省份。王闿运说，湖南“财赋全盛时，才敌一大县，院司之选在直省下等”^{〔3〕}。曾国藩也说湖南“山国荒僻之亚”^{〔4〕}多山、贫瘠，交通阻隔，给湖南人带来了贫穷和落后，同时也养成了湖南人吃苦耐劳和坚毅强悍的个性和民风。湖南又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西部和南部各民族杂居，分别与四川、贵州和广东、广西接壤。民族关系、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加之地主官僚兼并土地的现象也比较严重，造成大批农民或沦为佃农，或进入游民无产者的行列。所以这里打着“反清复明”旗号的民间秘密会社——天地会、青龙会、白虎会、白教、黄教、红教等等迅猛发展，一遇天灾人祸，往往发生起义或变乱。乾隆末年的湘黔苗民起义，成为川楚白莲教大起义的前奏。清政府为镇压这次起义调动了七省的兵力、财力。道光以来，各地起义更加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影响较大的如道光十二年（1832年）瑶